



香港作家小说选

花城出版社

I247.7

5

香港作家小说选

曾敏之 编



Z069394

花城出版社

24471

香港作家小说选

曾敏之 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75印张 243,000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3,500册

书号 10261·227 定价 1.05元

序

曾敏之

继《香港作家散文选》出版之后，花城出版社又委托我编辑《香港作家小说选》。能为沟通香港与内地文学交流略尽绵力，我是引为荣幸和愉快的。而花城出版社之重视文学交流，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与发展，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。

香港作家的小说有别于散文的表现，这种形式是普遍为他们运用的。运用这种形式，在作家来说多围绕着一个构想，就是以人物为描写中心，通过完整的或片断的故事情节、环境布局，更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生活，不论是人物的悲欢离合、都市的风情、下层劳动人民的遭遇……都在小说中通过叙事与刻画作了反映，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“东方之珠”的香港所呈现的众生相。所选的作品，主要出自各个作家的严肃态度，但也出自编者所持的尺度，而用意可以归结到一点，就是从作品中有助于认识香港的社会现实，抚摸到这个都市各种典型人物的脉搏，令人对资本主义商品化所加于人的精神桎梏获得深刻的理解。本来，小说的功能就在于反映社会，描写人物活动的，也是表现人生理想的，作品的深刻性也需要从这方面显示出来才有其价值。这里所选的作品，可以看到作家是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

作方法企求达到深刻性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，虽然它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特征，但由于国际性及现代化的程度，使它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，因此作家在反映生活、描写人物的技巧方面，也就有多样化的表现。西方文学有各种流派，表现技巧也依流派而有所区别，香港文学界对借鉴西方技巧方面是较重视的，因而也就运用到创作上来。当我们接触到这些作品时，是会有这样的感觉的。

很长时间来，已形成一种偏向，就是避谈文学技巧，偏重内容。其实，作家选定了题材之后，就必须寻找适合于表现题材的形式。内容固然决定形式，形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，这种辩证关系是不可割裂的，愈重要的题材，愈需要高超的表现形式。我们固然否定片面追求外在形式效果的创作倾向，但也不能忽略艺术形式。香港作家较少受教条主义的束缚，因而他们在创作上的表现形式是有参考作用的。

有人说香港是“文化沙漠”，纯文学难以发展，但也有一批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耕耘的朋友，他们在艰苦中拓荒、播种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可是时代毕竟向前，形势在变化，《香港作家小说选》的出版就可证明他们的耕耘、播种正在开花结果。“春华秋实”之义，从来是不辜负有心人的。

向前看，我相信香港文学的前景有着灿烂的明天。我在这里所做的不过是传讯的使者工作而已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于香港。

责任编辑：郑潜云

封面设计：陈子刚

书号 10261·227
定价 1.05 元

目 录

阮 朗	1
迎春花开	
舒巷城	21
伦敦的八月	
陌生人	
海 辛	73
夏日假期	
秀发的故事	
金 依	99
黑 仔	
刘以鬯	125
一个月薪水	
陶 然	133
红色的玫瑰花	
一万元	
张君默	153
异 域	
徐 速	169
芳 邻	

东 瑞	207
系在狗腿上的人	
玻璃窗前的袋鼠人	
谭秀牧	233
魔 掌	
王乃凡	253
狂 飙	
夏 易	273
梦芬的黄昏	
关	
陈浩泉	303
银色的梦	
双 翼	325
巴士上的一个半小时	
嘉 琦	337
难兄难弟	
张 雨	349
两个犯人	
李辉英	361
“对，对，对极了。”	
李伟生	373
喘息的海	
白 洛	387
赛马日	

阮 朗

一 篇

迎春花开

喜欢花，可不懂得养花，更记不住花的名字。对于一个生长在“花果山”的人来说，常有“乍见故人难呼其名”的困窘，这份难堪十分辛辣。

譬如那天和三几个老朋友和年轻朋友到沙田郊游，下了巴士上车公庙打了个转，年轻人嚷着要去探访那位风雨无阻，成年盼望丈夫归航的“石妇”，我们几个都已给阳光晒得冒汗，除了贪婪地多望一眼田野和海岸，就想喝些什么，而泥土的芳香又连想到吃，于是约好在前面那家菜馆等他们一起晚餐，我们就忙不迭进去喝啤酒。

可能是假日，又可能是新的一年就要在几十个小时之后到来，这家小饭店里有着一大批郊游顾客，紧挨在我们身边的那桌，看来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该读小学的孩子，而迅速使我们感到生趣盎然的，是有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束花，他的父亲正在问伙计要一个空酒瓶，由他自己去洗干净，带回去。

“这花好面熟，”我说，“花是黄的，叶是绿的，不过它的

名字……”

朋友们都笑出声来。老陈说：“还算不错，你没醉，没说花是黑的，叶是白的……”

“喝完再说，”老王举杯，“反正凡是花，都认识你张先生，你，可都不认识它们咯！”

我当然不干，告诉他们，我还认识不少花哩！海棠、含笑、菊、兰、梅、莲、枇杷花、葵花、鸡冠花、菜花……

老陈是我们中间的园艺家，他指指孩子手里花，说：

“啤酒你请，我来说。好？——好！那我告诉你，这是迎春花。”

“哦，迎春花！”

“你懂？”

“不不，刚懂，刚懂。”

“迎春花有两种，”笑声里他有板有眼地说，“瞧，这一种属于小灌木，茎上部非常纤细，拖得长长地象根藤蔓似的，叶是复叶，早春开黄花，有六瓣，花比叶先开，是春花里面最早开花的一种——”

“所以叫迎春花——”

“又来了，你懂？”

“哦哦，刚懂，刚懂。”

“另外一种呢？”老王问。

“另外一种迎春花，”老陈道，“属于落叶乔木，树高好几丈，花刚开时尖锐得象个笔尖，所以又叫‘木笔’，叶子象柿叶，稍为狭长些，春初开花有紫白两色，足足有莲花那么

大——”

“莲花我认得。”

“那你说下去，我乐得喝酒。”

“哎哎，听你说迎春花嘛！”

“那种花比酒还香咧。”老陈啧啧地赞叹，“真的是香味馥郁！”

“玉兰花！”老陈道，“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又不是。”老王道，“花王叫它辛夷玉兰，玉兰花九瓣，长些；辛夷六瓣，短些，可是阔一些，它们也都叫迎春花。”

人们的注意力移到邻座那个酒瓶里的小黄花上，我在注视它是否复叶，但是当眼光接触到那个孩子的父亲时，我几乎傻了——是个熟人，可又说不上名字。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微胖、矮小、结实，眉毛和眼睛都很长，这是他使我留下印象的特征。

他也一怔——肯定他对我还有点“印象”。

朋友们都在笑。笑什么？我知道。笑我不但认不得迎春花，而且连同来迎春的熟人，也叫不出名字了。

但是，相距不过一二尺，双方不可能扭过头算了，这位年轻人站了起来，伸过手来，用带点四川音的普通话说：

“久违久违！”马上掏给我一张名片：“彭永璧 香港宇宙洋行业务部经理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脸上发烫，“我没带名片，我是张浩。我记起来了，你的老太爷……”

“这是内人，”他立刻给我介绍他的妻子、孩子，我也不能不把老朋友介绍给他。但当老王、老陈低声问我这是个什么样的熟人时，我只能含含糊糊苦笑，答应他们慢慢再给“讲古”了。

那是一九五一年新年期间的事了。

香港大酒店的“鳄鱼潭”还在。

我从报馆“转行”，在几间学校教几点钟课，因为放假，和一位长辈到“鳄鱼潭”闲聊。

古老、宽敞的大厅，厚厚的地毯，长长的沙发，不论熟人陌生人，在一个地方甚至一张长沙发上要点饮料，吃些西点，并不显得拥挤。因为赶上新年，刚过耶诞假期，大酒店的壁饰和瓶花什么的，洋溢着迎春的喜气。中外客人三三两两各自谈心，我正在向那位长辈说些近况，冷不防一个高大肥胖、满嘴酒味的中年人，三脚两步从对面迈到了我跟前。

“哈，哥子！是你呀！你好哇！”

“哦！”我一怔，迅速辨清了他原蒋军第七十军整编的七十师政治部主任，姓杨。那是当我在一家报馆工作，给派到华东内战前线采访时，在苏北涟水战场认识的，那个师的师长张灵甫和他这个政治部主任，对我们那批战地记者特别“好”，希望“用哥子生花妙笔，替我们主持公道嘛！”发动内战弄了个搬起砖头自压脚，还要人家“主持公道”，这种“公道”在我来说，是恁地也没办法主持的了。不过那是一九四六年大雪纷飞时的事，直到一九五一年，在我工作的报纸上

没半个字捧场，张灵甫已经被歼孟良崮，当年的杨主任又来到了香港，不会冤家路窄，兴师问罪罢？于是我打量了这位曾挂中将衔者一眼，好家伙，当年他们是“最新式配备”，今天他尽管孑然一身，可是那套西装，以及那件大衣，按照当时的物价，我这个穷教员不吃不喝不要床位，也得干上两年，而且还不包括他的那双名贵皮鞋，手上的钻戒，特地滑出手腕的白金名表，以及一如当年他那条横斜小皮带似的，挂在胸前背心口袋里的黄澄澄金链在内。

“哦哦，杨先生，既发福，又发财啦！”

“龟儿子，金子生意硬是要得！”他忽地把肥手一指，“娃娃，过来！叫张伯伯！”

于是一个少年从对面跑了过来，立在我们面前，腼腆地，悄悄地叫我：“张伯伯！”还行了个礼。

“都来啦？”我有些困窘，“这是最大的少君罢？”

“对，他是老大，——对，哥子，我不姓杨，是姓彭，我的老大叫彭家璧，”接着当面训子道，“张伯伯——对，你现在做啥子呀？还在那家报馆吗？”

“我在教书，”我说，“已改行了。”

“也好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只有你们那家报纸不给面子，那一年你们走后，我一直留心报纸，家家都有七十师‘捷报频传’的消息，你们没登，龟儿子硬是要不得！”一下子可又扯到了这个，“哥子，今天幸会！我们刚刚在上面喝完喜酒，下来喝点咖啡，咖啡哟，哥子再来一杯，我请客，今天不算，第二天你到大道中我铺子里来。”接着塞给我一张名片：“大家在

外面跑，出外靠朋友嘛，哥子你今后要多多指教——”说完就准备走了。

我送他到门口，看清楚了他的脸胖得近乎浮肿，也看清楚了儿子羞怯得象个女孩子，有两道好长好长的眉毛，两只好宽好宽的眼睛。

“彭先生，”我当着门口小童问他，“你们的张军长死了，当时你一定受惊了吧？我们在涟水虽然只有大半天，可是看见你和他寸步不离——”

“命嘛！哥子，”他一手拍拍我的肩膀，“这有啥子办法！当年你们进涟水，全城不是只剩下一个瞎眼婆吗？人家坚壁清野，原来是自己退出的，后来我们就追，从苏北追到鲁南，连个影子都没得！老张可得意啦！他攻进涟水已经逾限二十天，这回就想来个歼灭战，面子上好看些，还可以升官嘛！可是我人他先人板板的——”他忽然煞住了，苦笑道，“哥子，改天我们摆龙门阵再说。不要忘记，有啥子金银生意，介绍到大道中找我。”

小童开了门，我一直送上行人道，再问：

“那你怎么离开孟良崗的？你哥子可有本事哪！”

“我根本没上孟良崗，”他把一张肥嘴凑到我耳朵边，沙沙地低声说，“我早看到不是路啦，躺在死人堆里，好不容易爬起来，衣服换了，姓名也换了，不再姓杨改姓彭，哈哈，老子还算有点办法！”一挺胸，把大衣一抖，问，“混得还不错吧？好好，改天来我铺子里喝茶。”

我不肯放手，跟着他走：

“你硬是有办法！”我说，“你哥子自己说的，躲在死人堆里逃了出来，那你做生意的本钱又怎样事先弄妥的？”

“你真是！”他的劲儿来了，“我说过，我早看出不是路数！我借口召集政工人员开会，把积蓄派我舅子专差送到了四川，要他姊带着娃儿往香港跑，一路好辛苦，好在我舅子从‘国军’到‘袍哥’的关系都有……你改天到大道中找我，自己问他嘛，他是我金号的总经理——”又加了句，“孔、宋都顾不了他，我是老几？哈！我更管不了啦！”

没想到会邂逅这个人，回到“鳄鱼潭”，得要向我那个长辈谈谈这件事，陷在那一次罕见的采访过程里，迎春的气氛倏地有异。

当然，一九四六年隆冬的苏北战场采访，是怀着迎春的心情出发的。尽管上海还处在深沉的苦难、激烈的动荡之中，尽管此行所写通讯，所发专电在所谓“民主自由”之下既无采访的把握，更无发表的把握，还是欣然就道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饭碗，而主要是为了迎接春天的来到，顶上飘着鹅毛大雪，腊梅开在山腰，尽管说这是酷寒的隆冬，但应该承认：春天的信息是越来越近了。

我只是数以亿计，渴盼摆脱“三座大山”重压的中国人民之一员，个人的安全与否早已不是个问题，而怎样传达春的消息，使大伙儿获得更大的鼓舞，那倒是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重大课题。原来的统治者在“还乡团”之后回去了，乡

亲们惦念撤离了的解放军战士的消息……

在扬州著名的富春楼外，行乞的长龙至少有半里，内中有一个老翁穿着入殓时用的寿衣，也排着队等待施舍，给予人们一个极其尖锐生动的印象：旧社会是该“入殓”了。在仙女庙——那个著名佃农缴粮的地方，不是秋收时节也挤满了扬谷场，原来是衙门在解放军撤离后，要贫雇农补纳无从纳起的各种“欠租”，一个卖儿鬻女，家破人亡的普遍惨剧，又将在愤怒的大地上重演……

在高邮，一个来自徐州的理发师，冒充“专员”获得了果戈里《钦差大臣》的戏剧效果。在淮安，凳子还没坐热的统治者，为浆糊未干的解放军后撤布告而寝不安枕。在东台，“机械化兵团”一百军（师）李天霞部为恁地打不通通榆公路而无法交差，从上海带去的一群舞女并不等于“最佳装备”，对他更没半点帮助。在宿迁，全城成为伤兵收容院，即使有面子的旅客住店，也得稍候哪间房里有伤兵咽气。在泗阳，整个城区只是一所废墟，那主要是“B29”的战绩。在淮阴，江苏省政府王懋功派了个干员王公屿设了个临时省府办事处，为英勇战士们的后撤，到处寻找南京上海一带的记者：“好材料，帮帮忙，共军已经离开苏北，‘国军’正在‘追奔逐北’，张军长（他们不称张灵甫为师长）刚刚打下涟水，我们请各位到涟水实地采访，看看‘国军的辉煌战绩’。”……

整个苏北不是在雪花飞舞下颤栗，而是在人为的酷寒中动荡！自以为“胜利”了的混球们一手压善良，一脸请帮忙，独独有一个官儿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甚至连话都不屑多说